

自由派的阴谋

文化自由同盟与
战后欧洲人心的
争夺

〔澳〕彼得·科尔曼著

東方出版社



2 059 9028 5

— 031

自由派的阴谋

文化自由同盟与战后欧洲人心的争夺

東方出版社

黄家宁

季宏译

许天舒

责任编辑：王一禾

装帧设计：王师颀

版式设计：朱 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派的阴谋：文化自由同盟与战后欧洲人心的争夺/
ZIYOU PAI DE YINMOU

(澳)科尔曼(Coleman, P.)著；黄家宁 季宏 许天舒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10

书名原文：The Liberal Conspiracy: 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Mind
of Postwar Europe

ISBN 7-5060-0407-0

I. 自…

I. ①科…②黄…

II. ①文化自由同盟-史料②中央情报局(美国)-关系-
文化自由同盟

IV. D564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625

字数：206千字 印数：1—1500册

定价：8.00元

606 49/40

19

译者的话

《自由派的阴谋》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中国说“鲜为人知”一点也不夸张，因为从 50 年代起，中国跟外界隔绝了几十年。

1950年6月，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出兵朝鲜，柏林有一群文化人与之遥相呼应，成立了一个称作文化自由同盟的组织，喊出了“自由派开始反攻”的口号。在短短10年里，文化自由同盟在35个国家建立分支机构，雇佣280名工作人员，创办几十种不同语言的杂志，召开几十次大会和研讨会，举行几次大型联欢节，在全球形成一股气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有点风吹草动，文化自由同盟立即作出反应，或抗议，或声援，热闹非常。是谁出钱资助这些文化人？《纽约时报》揭开了这个秘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秘密资助这个世界性的组织。《纽约时报》把内幕曝光之日，恰是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日益不得人心之时，中央情报局插手越战已臭不可闻，拿了中央情报局的钱得以在全世界开展活动的文化自由同盟，在秘密资助之事昭然于天下时，不得不宣布解散。

自由派的这个阴谋，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

首先，中央情报局的策略是成功的。他们认为无法影响共产党的“顽固派”，需要打击分化的是共产党的“同路人”，需要争取的是“中立主义者”，能够完成这个使命的不是西方自由世界的“顽固派”，而是“非共左派”。文化自由同盟的领导成员大多曾参加共产党，甚至是共产国际的委员，后来或者自己退党，或者被开除出党。

中央情报局认为，给他们钱，由他们来领导这场斗争是最合适的。

其次，文化自由同盟的活动方式是灵活的。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同盟在各国举的旗子、喊的口号也不同。同盟在印度成立的分会反对尼赫鲁总理，尼赫鲁总理也把他们视为“美国阵线”，双方对峙不下。同盟从全球着眼，认为“尼赫鲁主义”总比“毛主义”好，因此改变态度，另成立一个亲尼赫鲁的同盟亚洲局。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再次，这些自由派人士为达到目的而坚持不舍。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文化自由同盟的中欧东欧工作计划。为了渗透“铁幕”，同盟组织了对东欧的无线电广播，给东欧知识分子直接邮寄书籍和杂志，组织东西方编辑或作家开座谈会，哪怕从几十个与会者中找到一个易受影响的人也算成功，出版东方持不同政见者被查禁的书，为逃往西方的人提供路费和生活津贴，为流亡青年开办大学……可谓心机算尽。

《自由派的阴谋》一书的作者是文化自由同盟澳大利亚分会的成员，是同盟所办杂志《四分仪》的主编。他历时10年收集材料写这本书，是想为文化自由同盟恢复名誉，因为在1989年成书之时，东欧与苏联剧变已露端倪，在自由派看来，这是他们多年工作的结果，50年代就为此东奔西跑大声疾呼的人，无疑是应该佩带勋章的。中国人读这本书，恐怕难以无动于衷，因为这是与我们有关的历史。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直是自由派阴谋的目标。我们对此要有所警惕，而本书有助于了解自由派的阴谋活动。

前 言

1950年6月，欧洲的冷战愈演愈烈，亚洲的北朝鲜入侵南朝鲜，此时来自欧洲和美国的100多名作家和知识分子在柏林集会，成立了文化自由同盟，目的在于击退克里姆林宫对自由民主价值准则发起的持续不断的攻击。在50年代，文化自由同盟的活动遍及全球，成功地创办了一系列杂志，出版了书籍，召开了会议，举办了文化节，发起了抗议活动，建立了庞大的分支机构网络并加强了个人之间的联系。文化自由同盟的活动持续到60年代，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立国际自由民主知识分子团体上来。争取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支持自由民主事业是美国的主要目的。

越南战争时期，出现了一个新左派、一个新保守派，也出现了缓和，文化自由同盟开始犹豫不定。1967年，同盟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一事被揭露，最终不得不解散。其后成立的国际文化自由协会，从未再激发出同盟存在期间的热情，也从未取得可与早期同盟媲美的成就。

1967年，文化自由同盟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消息在全世界传开，我本人遂对此事产生了兴趣。我当时是文化自由同盟的澳大利亚分会澳大利亚文化自由协会的成员，并刚刚被任命为澳大利亚与同盟合办的杂志《四分仪》的主编。文化自由同盟虽然受到攻击，但在若干年里依然赢得我的忠诚，同盟的杂志还帮助我认识了世界。当新闻记者就接受资助一事采访我时，我坦率又坚定地，编辑部作出的任何决定从未受到外界压力，尤其是未受到

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样的美国机构的影响。(全世界同我境遇相似的大多数人,当然不会是所有的人,也都是这样说的。)我还补充说,参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活动或了解内情的任何人,应退出同盟,或开除出同盟。现在,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深入了解,我认为我当时那样说是一种残酷的虚伪的表现。

但是疑问无法排除。譬如,1952年在巴黎举办大规模文化艺术节的主张是文化自由同盟知识分子酝酿讨论后提出来的,还是当时在“文化节之战”中屡屡失利的美国政府想反击而提出来的呢?60年代文化自由同盟在拉丁美洲和非洲采取各种积极行动,全部是同盟自发的主张,还是部分由肯尼迪政府提示的呢?同盟想与苏联作家联系,是完全出于表示团结,还是中央情报局也有所图?

我决定探究文化自由同盟活动的始末,于是对同盟创办的杂志,各国分会,同盟召开的会议和举办的文化节,同盟发起的抗议活动进行调查,看看能否消除我的疑问。

但愿我历时10年的调查,最终掌握了中央情报局所起作用的全部情况。中央情报局以前的一些官员,如威廉·科尔比、小莱曼·柯克帕特里克、托马斯·沃德尔·布雷登,写了关于中央情报局资助文化自由同盟活动的情况,但不详尽。其他一些人,如小科德·迈耶,较详细地写了中央情报局与(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合作的情况。但是,当我根据新闻自由法请求中央情报局提供1950年到1967年的档案材料时,我只收到了文化自由同盟解散后出版的一张《纽约时报》的剪报,并附了一句话:“此处无您所要的任何其他档案材料。”

中央情报局不予合作,我无法从官方渠道得到中央情报局参与文化自由同盟活动的重要信息。不过,我敢说,同我采访过的任何人相比,我更了解文化自由同盟在世界各地的活动,更了解同盟

圈内的人的计划与意图，也更了解他们对中央情报局秘密资助的情况知情多少。在解开我的疑团的过程中，我还得出结论，谁给谁钱，怎样给钱，为什么给钱等等间谍活动中常有的问题实际上已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我涉足其中之后，出乎意料地挖掘到一个惊人的故事，看到满怀理想，英勇无畏和有远见卓识的文化自由同盟的成员投入一场反对斯大林主义及其追随者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经历了斗争带来的苦难和残暴。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一场不能避免的斗争，而在当时，在世界上大多数人尚未觉察到的情况下，他们就在进行战斗了。

本书总结了我调查文化自由同盟活动的情况，论述了同盟的功绩与失败，或许也为了解现代史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

目 录

前 言	1
1. 走出迷茫	1
2. 1950年的攻势	15
3. 告别柏林	35
4. 《冲突》，“我们最得力的刊物”	62
5. 反潮流的杂志	85
6. 柏拉图式盛宴	110
7. 不可能的对话	132
8. 远征世界	148
9. “讨厌的”美国人	169
10. 改变方向：“新的启蒙”	182
11. 60年代的杂志	194
12. “不发达”国家对自由的希望和幻想	211
13. 渗透到铁幕后面	224
14. 秘密行动？	232
15. 经受打击之后：“未形成共识”	249
16. 对文化自由同盟的回顾	257
附录一 文化自由同盟宣言（柏林，1950年）	263
附录二 1966年文化自由同盟开支一览表	266

1. 走出迷茫

绷紧的绳子突然断了，不过，下面有张安全网。1938年我到那里的时候，发现自己被形形色色的人包围着。他们当中有失去了思想平衡的老政客、托洛茨基分子、挑剔的同情者、独立的“秘密分子”、新政治活动家、新共和主义者、赞成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等等。他们以各种扭曲的姿势在这张网中趴着。悬吊在这迷茫之地上，我们都感到痛苦不堪。

阿瑟·凯斯特勒，
《失败的上帝》，1949年

1950年6月28日，星期四下午，在柏林英占区的一个公园里，阿瑟·凯斯特勒面对15000名听众疾呼：“朋友们，自由派开始进攻了！”此时此刻，他振奋不已。那是人称“文化自由同盟”国际会议的最后一天，文化自由是当时许多左翼集会的主旨。45岁的凯斯特勒是《午间的黑暗》一书的作者，他为了在集会上宣读这份反共、反中立、自由主义的《自由宣言》，策划了几个星期，争论了数日，花了不少时间起草和修订，现在他感到精疲力竭了。

不过，此刻他也感到成功的喜悦。他提出要“开始进攻”，原因是至少15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自由主义舆论为苏联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辩解，为苏联残酷镇压中欧和东欧可能

出现的民主辩解，称那是苏联对付西方帝国主义确保安全的需要，或称与反动政权复辟相比总是一种进步。如乔治·奥威尔1946年所说，“苏联神话对英国知识界产生了有害影响”，致使事实被掩盖或歪曲，人们“怀疑是否能够写出一部真实的现代史”。同年，《党派评论》发表威廉·巴雷特撰写的社论，谴责在美国的“自由主义第五纵队”，为苏联利益发起了“隐瞒、歪曲和欺骗”的运动。如今在希特勒死后的柏林废墟上，一个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左翼反共分子的联盟终于形成了。

即使在苏联神话最坚不可摧的时候，在社会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自由意志论者和马克思主义左翼知识分子中，一直有人持异议。不信苏联神话的，在美国有托洛茨基分子（马克斯·伊斯曼、马克斯·沙赫特曼、詹姆斯·伯纳姆），修正主义哲学家（西德尼·胡克），流亡的孟什维克（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索尔·莱维塔斯）以及自由主义的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在英国伯特兰·罗素、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乔治·奥威尔、费维尔和出版商弗雷德里克·沃伯格；在法国鲍里斯·索瓦雷恩、安东·西利加和访苏归来的安德烈·纪德。德国的弗兰茨·博克诺和理查德·洛温撒尔（保罗）不能接受斯大林主义者把社会民主党人称为“社会法西斯分子”。而奥地利的马内·斯伯尔贝在莫斯科大清洗杀害他的朋友和同志后，也与共产党决裂了。在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逃脱了法西斯分子魔爪的伊尼亚齐奥·西洛内以及遭法西斯拘留的阿尔铁罗·斯皮内利也由于莫斯科的清洗运动与共产主义者分道扬镳。比利时的查尔斯·普里斯尼耶也不信苏联神话，他的反斯大林小说《假护照》颇有影响。西班牙则有安德烈·宁和朱利安·戈尔金。澳大利亚的哲学家约翰·安德森已不再是共产党的“理论顾问”，他变成了从左翼批评共产党的主将。被囚禁在印度监狱中的革命家罗伊、自由主义者米诺·马沙尼和甘地信

徒贾亚普拉查·纳拉扬也以自己的方式批判了斯大林主义。

不信苏联神话的人遍及全世界，不过，这些反斯大林主义的作家和左翼知识分子仍居少数，他们没有成立任何国家的或国际的组织，远不能够与斯大林主义者及其同路人的霸权对抗。他们生活在迷茫的状态之中。许多人还对自己反斯大林主义踌躇不决，甚至惶恐不安。譬如，1934年马克斯·伊斯曼解释了他迟迟不发表《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的原因，因为这本书详尽地描述了斯大林对作家和艺术家的迫害，他担心出版该书将伤害“苏联人”。1936年，纪德承认在出版《从苏联归来》一书前，他有过类似的忧虑。1938年，阿瑟·凯斯特勒在宣布脱离德国共产党的信件末尾写了“苏联万岁！”在一个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中恢复过来，饱尝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扩张之苦的世界里，苏联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是人类的最后希望，在未了解事实前不信任苏联就是一种背叛行为。然而，伴随着现实生活中斯大林主义制造的每一个新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如集体化、乌克兰大饥荒、莫斯科大审判、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西班牙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背叛、希特勒与斯大林缔结条约、暗杀托洛茨基、袭击芬兰以及古拉格劳改营内幕的披露，背叛苏联的人越来越多。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拥有忠诚的民众，其中不乏上层知识分子。

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参加的国际会议的情况最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譬如，1935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国际作家保护文化会议，云集了有广泛代表性的作家，如安德烈·纪德、朱利安·本达、安德烈·马尔罗、福斯特、奥尔德斯·赫胥黎、亨利希曼、布莱希特·弗兰克、赛奥多·德莱赛、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伊萨克·贝贝尔和恩岑斯贝格尔。不过，用历史学家罗杰·沙特克的话来说，这次会议是“一次以文化与自由的名义攻击西方文学的控制最严和最以势压人的集会。”杰出的意大利反法西斯历史学

家盖塔诺·萨尔维米尼谈到苏联镇压自由时被嘘下讲台。有反苏表现的保罗·艾吕雅只允许在午夜过后发言，因为那时大多数与会者都回家去了。据福斯特说，之所以允许朱利安·本达批评共产主义，是因为他的批评是“学术性的”。会议的组织者、斯大林主义者约翰尼斯·贝歇尔责怪古斯塔夫·雷格勒，说他身为主席，允许大会高唱国际歌，太露骨地揭示了共产党对会议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操纵又恢复了。1947年10月，正值苏联清洗异己作家、哲学家和音乐家的高潮，在东柏林召开了一次德国作家大会。而在9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波兰成立，给世界投下了共产主义新攻势的阴影。苏联派了三个知名的作家和编辑出席东柏林会议，但没有请代表自由西方或有叛逆传统的人出席会议。德国人在纳粹倒台后尚噤若寒蝉，不是缄默不语，也是小心翼翼的（他们如果批评四个占领国的任何一位代表，就将受到责难，并有可能被捕）。为打乱共产党人对会议周密的安排，一名27岁的美国记者梅尔文·拉斯基发表了35分钟动情的讲话，对苏联遭受迫害的作家和艺术家表示敬意，并指名道姓地提到了安娜·阿赫马托娃、米哈伊尔·左什琴科和谢尔盖·爱森斯坦，称他们是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我们在精神上支持苏俄的作家与艺术家……我们知道，在身后站着政治检查员，政治检查员身后还站着警察的情况下创作，精神是多么痛苦。”）一个盲目效忠苏联的人立即斥责拉斯基是“煽动战争的可憎的法西斯分子”，是“好莱坞廉价复制的托洛茨基”。但是德国作家起立向拉斯基欢呼致意。在一个从事反苏活动会危及自身安全的城市，他发表那种演讲是勇敢的行动。不过，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孤立的姿态。美国当局急于维持战后“盟国间的和睦关系”，曾考虑将拉斯基逐出柏林。

翌年（1948年）9月，在洛兹拉夫（前称布勒斯劳）召开的较

大规模的争取和平文化大会，西方的抗议更强烈了。苏联推行强硬路线，既反对西方民主国家，又反对铁托的南斯拉夫，苏联最近还把南斯拉夫逐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法捷耶夫作了基调发言。他说，“如果鬣狗会打字，豺狼会写字的话，它们也会像艾略特、尤金·奥尼尔、让·保罗·萨特和安德烈·马尔罗那样写作。”爱伦堡则说，根本不存在“西方文化”，而乔治·卢卡斯宣称西方资产阶级知识界是无法理解苏联文化的。

与会者中较为温和的“离经叛道者”是哲学家、小说家、《学者的背叛》一书的作者朱利安·本达，他反对在每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时要大家鼓掌。当时担任现代派亲共杂志《科技报》主编的埃利奥·维托里尼说，苏联的艺术家是“苏联的黑人”。但抗议声最高昂的是两位历史学家，牛津的泰勒和纽约的布莱恩·霍夫德。泰勒的发言没有拉斯基在柏林会议上的讲话那样深刻，内容较为中立，他同时谴责“华尔街”和“克里姆林宫”。但是这同拉斯基的行动一样，也是铁幕后讲坛上英勇的举动，并且争取到众多的代表，阻止会议一致通过一项反美决议。会议中的这些“节外生枝”，完全不是精心策划的。正如《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主编金斯利·马丁所抱怨的，抗议者缺乏“协商、团结或组织”。

在1949年3月和4月召开的两次共产国际和平大会，情况迥然不同。3月在纽约召开的会议，发起人有艾伯特·爱因斯坦、查理·卓别林，保罗·罗伯逊和利昂纳德·伯恩斯坦。与会者有苏联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和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法国的保罗·伊鲁亚德（现又加入苏联阵线），英国的奥拉夫·斯特普尔顿以及美国的霍华德·法斯特、马修森、克利福德·奥德茨、艾伦·科普兰和莉莲·赫尔曼。会场设在阿斯托里亚饭店，以炫耀会议抵制“美国战争贩子”。不过这次反共人士成立了一个对抗的组

织“美国人争取文化自由协会”，成员包括西德尼·胡克、德怀特·麦克唐纳、玛丽·麦卡锡、尼科拉斯·那波科夫和阿诺德·贝奇曼。每次开会，他们轮番就苏联艺术家的命运向会议发言人提出问题。德怀特·麦克唐纳问法捷耶夫为什么屈从政治局的指示，改写他的小说《青年近卫军》。法捷耶夫回答说：“政治局的批评意见对我的写作大有帮助。”尼科拉斯·那波科夫问肖斯塔科维奇是否同意《真理报》所说，像辛德米斯，舍恩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这样的“帝国主义走狗”应在苏联受到谴责呢？肖斯塔科维奇哆嗦着说，是的。（他后来写道，当时他想，“回到苏联，我就完了。”）美国人争取文化自由协会还在自由厅组织一次集会，大约数千人聚集在布赖恩特公园，挤得水泄不通，听西德尼·胡克、马克斯·伊斯特曼和尼科拉斯·那波科夫谈论苏联知识分子被骚扰、迫害和处决的情况。

由斯大林的门徒主持的正式会议通过了最后决议，同弗洛兹瓦夫会议的决议相比，措词不太强硬，内容不太反美了。决议仅呼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共产党的同路人只得等待在麦迪逊广场公园召开的18000人参加的最后一次群众大会，来厉声谴责美国。

美国人争取文化自由协会的对抗远比前几次会议几个人孤立的抗议有力。西德尼·胡克后来写道：“我们一举挫败了克里姆林宫最雄心勃勃的一次行动。”德怀特·麦克唐纳激动地写道，“反共左翼人士采取了攻势。”1950年，凯斯特勒在柏林发言时援引了这句话。

威廉·巴雷特没那么乐观，他说，只不过问了几个令人窘迫的问题，召开了一次反斯大林主义大会，但规模远不如亲苏的正式大会。他得出了“令人忧愁的印象：美国迄今还没有一个资金雄厚，方向明确，能在令人满意的文化层次上与斯大林主义宣传抗争的组织”。至少另一名与会者迈克尔·乔塞尔森认为，与斯大林主义

者的对抗有点鼓舞人心，他对他的朋友作曲家尼科拉斯·那波科夫说：“我们在柏林也应该有这种表现。”乔塞尔森当时是美国国务院驻柏林的文化官员。他后来在替中央情报局管理文化自由同盟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美国人争取文化自由协会的举动鼓舞了法国社会党人达维德·鲁塞，他计划成立一个类似的团体，与纽约会议一个月之后，1949年4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抗衡。出席前一届和平大会的不少人再次出席了这一届和平大会，如苏联的伊里亚·爱伦堡和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美国的保罗·罗伯逊和霍华德·法斯特，英国的休利特·约翰逊和考尼·齐利亚库斯，法国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和意大利的皮厄特罗·南尼。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也派遣了大型代表团出席会议。查利·卓别林发了贺电，毕加索画了《和平鸽》，一位苏联传教士为会议祈祷，保罗·罗伯逊唱了一曲《老人河》。中国共产党人占领南京的消息传来，“和平”代表们欢呼雀跃。巴黎会议的组织者避免重蹈弗洛兹瓦夫和纽约会议覆辙，甚至不允许持异议者听取会议发言。3万人集合在布法罗体育场聆听反美演讲，其中成千上万人乘火车和“和平大篷车”前来，会议随后通过了最后决议，但仍然与纽约决议一样含糊其词，只是笼统地反对西方。

达维德·鲁塞导演的对台戏“反专政与战争国际日”，本打算按照美国人争取文化自由协会在纽约的活动方式，挫败克里姆林宫在巴黎的活动。然而精心策划的对台戏还是失败了。埃莉诺·罗斯福，厄普顿·辛克莱，约翰·多斯帕索斯，朱利安·赫胥黎和克罗斯曼给会议发了支持电。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伊尼亚齐奥·西洛内、卡洛·莱维、西德尼·胡克、詹姆斯·法雷尔、弗兰茨·博克诺和芬纳·布罗克韦。没有邀请雷蒙德·阿龙、阿瑟·凯斯特勒和詹姆斯·伯纳姆，因为他们“过于反共”。让-保罗·萨特、莫里斯

·梅洛-蓬蒂和理查德·赖特抵制会议。(不过,他们发来电文,谴责苏联的“恐怖主义”,同时也谴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恐怖主义。)在索邦召开的那次重要会议上,大多数发言者表现出了太明显的“中立主义”,对此,西德尼·胡克评论道:“30年前,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麦迪逊广场听过街头演说,从那以后,我还没听过这样的陈词滥调和空洞诡辩。”在当晚的集会上,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夺去麦克风,对会议横加谴责,每个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不管为成立一个自由民主反共的国际组织拟订什么样的计划,信奉萨特主义的“进步”的巴黎都是难以接受的。巴黎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追随者的首都,阿瑟·凯斯特勒阴郁地说,共产党在巴黎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占领全法国。

在某种意义上,除了美国人争取文化自由协会外,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对共产党及其追随者仅起了捣捣乱的作用,动摇不了他们对会议的控制。在此期间,除了希特勒、斯大林缔结和约的22个月外,持不同政见者仍居少数,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下只得采取守势,纽约也只得有一份《党派评论》反映他们的观点。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发现难以出书,千方百计出书以后,贬损之词纷至沓来,往往使书的销售量降至最低点。马克斯·伊斯曼的《穿制服的艺术家》总共只售出500本。乔治·奥韦尔的出版商维克托·戈兰茨对反共题材的小说《向卡塔洛尼亚致敬》不屑一顾(后来弗雷德里克·沃伯格出版了此书,仅售出700册)。伦敦的几家书商都拒绝出版奥维尔的《兽园》一书。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因为写了《莫斯科的冬天》而被隔离审查,他来到伦敦仅能勉强糊口,不得不到印度寻找工作。鲍里斯·索瓦雷恩难以找到一个出版商出他的《斯大林传》,这本书现已成为经典传记。凯斯特勒《午间的黑暗》一书的法文译者为了慎重起见,先是把真名,后是连笔名也从译著中删去了。汉娜·阿伦特找不到一个法国出版商出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